

# 亲家母,你坐下

文/谷以成

评剧《朝阳沟》里唱道:亲家母,你坐下,咱们说说知心话。岑老师最爱听了。但是,与现实中的亲家母,根本就坐不下来,更别提说知心话了。

根由就在亲家母的洁癖上。

结亲之前,因为都在中学做老师,就有耳闻。比如戴手套写板书啊,食堂的饭菜要用酒精炉重新加热啊,也就当稀奇听听,没怎么在意。谁知她的女儿竟做了岑老师的儿媳妇!这儿媳也是青出于蓝,光五颜六色的护袖就十几副,分伏案的做饭的洗衣服的养花草的,不能混用;闺房里满屋子都是来苏尔味道,弄得跟医院似的。

一结婚,儿子就搬到丈母娘家了,理由是靠小两口单位近,其实岑老师心里明白。不过她担心儿子受不了这对奇葩母女的行为举止,未曾想那臭小子竟说井井有条清清爽爽真是享受,连打小就有的哮喘病都不大犯了。听听,这意思过去28年都是在乱乱糟糟水深火热中度过?这不是娶了媳妇忘了娘?不过,也无所谓。只要小两口过得好就行,老不问世事,乐得个清闲。

但少事可以不问,少少的事不能不问。一问,又问出许多故事来。孙女润儿出生后,除了在医院保温箱里见了两回,便被亲家母雪藏起来了。爷爷奶奶想去看看,那程序复杂了。只能坐在专门的凳子上,一米开外隔着帐子看,说婴儿抵抗力弱,怕感染;后来大了点,要抱抱玩玩,必须把手反复洗了才行,还不许嘴巴亲;带去的玩具要消毒。那场景,好像亲家母是正宗的奶奶,自己就是个隔壁老太。想想,岑老师的眼泪就下来了。老伴就劝她,说这是心病,由不得自己的。有个主持人不也得过抑郁症么?整宿整宿睡不着,谁愿意这样折腾呢?岑老师听了这话,倒对亲家母生出些心疼怜惜了。换一

种心境看,心口好像不那么堵了。

转眼间,润儿三岁了,为了以后到好学区上学,亲家把房子换到了岑老师这个小区,还是同一栋楼。亲缘大约是阻隔不了的,润儿见天要到外婆家玩,跟哥哥小满常常是满地打滚,有时小满会从口袋里掏出几片小动物饼干,跟妹妹你一口我一口地分着吃,直到最后还吮吮手指。外婆和妈妈开始还说说,见孩子开心,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。岑老师自然是偷着乐呵。

忽然,亲家母的肺上长个瘤子,住进了医院,生活步骤就乱了。而岑老师倒是到了冷静显身手的时候,她调度两家指挥若定:儿子媳妇上班远,润儿上幼儿园就由姑姑骑电动车送;老伴负责买菜,吃饭都到这边家里;亲家母那头照料由岑老师亲自上阵,亲家公出入女人病房不方便;润儿想留宿就由着她,爷爷奶奶姑姑小满,想跟谁睡看她乐意。

亲家母开始还很别扭,但是,自己躺在床上想讲究也难,只能走到哪山说哪山话了。而且,岑老师毕竟比护工要体贴细心,家里家外的也能说到一起。再后来,对岑老师做的饭菜还真有点喜欢上了。隔三岔五又把两个小宝宝带来,她看了自然开心,身体恢复得很快。

出院后,岑老师在家烧了一大桌子菜,庆贺亲家母康复。四个爷们吱溜吱溜地喝着酒,四个女人议论着孩子厨艺柴米油盐,两个孩子满屋子追逐嬉闹,好大一个家,自然温馨。

等亲家母休养了一段时间,岑老师试探着问,我们去跳广场舞吧?对身体好呢!那位居然一口答应。于是,每到晚间,两个大妈便加入到广场舞的队伍中,一边跳还一边哼唱: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,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……



野外  
画/潘小庆

# 难题

文/尹春华



摄/尹春华

那是个溽热的夏天,与作家刘心武约好为其即将出版的《我是刘心武》一书拍摄封面照片。上午九点我们开车赴京,到达宾馆已时近中午。

在这之前的几日,我在电话中与刘心武的助手讲,请刘老师来拍照时,除了穿的一件衣服外,再带一件上衣,以备我拍摄时好有所调剂。下午三时,刘心武到来,隔着宾馆的大玻璃窗我便有些惊愕,只见刘先生着短裤,脚穿黑布鞋,短袖衬衣,一身上街遛弯的轻装打扮。——这可怎么拍?!

我看到作为拍摄的场地——一个宾馆小型会议室时已惊诧不已:一堆桌子、椅子擦叠在一起,空出来的一多半,便是我的“工作场地”。我抬过颇似学生上课的一张长桌和一把椅子,摆放在像仓库似的场地中央,那情状颇觉滑稽。我知道,这遇上了“船漏偏逢顶风雨”的挑战了,原想的种种拍摄方案全都不翼而飞。我让随同来的年轻编辑坐在那,赶紧试拍了两张。脑中猛然想起云游四海的高僧,人家“一瓶一钵”足矣,我也只有空手打天下了。

一九七七年,我第一次读刘心武的《班主任》便如晴天雷,印象深刻。在那改革开放的前夜,文中的清新之气包裹着魄力与胆识,被公认为“伤痕文学”的发轫之作,是我很喜欢的一位作家。看着眼前的刘心武,我心想:刘先生是太过于信任我,还是于漫不经心中考试于我。也可能什么都不是,但于我却是一道几近无米之炊的难题。

坐下闲谈中,说起他在美国讲学红楼梦,美国记者为他拍了不少照片,传回来四百多张,他较满意的有数幅。我们同看了一下,似不适宜做书的封面,更使此次拍摄有背水一战的情势。

刘先生倒是很随和。问怎么拍啊,我坐在哪?——我心自说,我还不知道怎么拍呢!我说:只有请您坐在小课桌这了。看着坐在这长条桌后的刘先生,想着

他在美国演讲的样子,心里直想笑。

我从天津只带来了一只闪光灯,原拟在一书房的环境中,用这灯在墙壁或屋顶上反一下光便足矣。这空荡的会议室却使这闪光灯无光可反,只有借助此室的一侧窗户做唯一光源了。为了活跃气氛,我说:刘老师,咱们先拍点“装模作样”的怎么样?在稍带轻松的笑声里,刘先生以他习惯的姿态拍了几幅。

刘先生在将与同去的二位编辑谈着即将出版的书中若干细节,我也完成了拍摄。只有以神见长,以生动取胜了。

他当即翻看了拍摄的十几幅照片。最后说了句:“到底是高手啊。”我忖度,一是拍得传神,是他心中所喜欢的构图、用光。二是,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中,拍出这样的片子,也是他称许有加的因素之一。我看了一下时间,前后拍摄十八分钟。

此次拍摄,让我之所以有如同过了一关的感觉,还有更重要的一层内涵:那天用的相机还是临时找朋友借的,佳能D50,我用得还有些不熟。若当场再需打电话问朋友怎么使用其中的某个功能,我想,刘先生一定大跌眼镜!

刘先生很高兴地选了一幅,做《我是刘心武》一书的封面。随着此书在《今晚报》《新民晚报》等十几家媒体的连载,这幅照片也在大江南北的报纸上连续亮相一个多月。

曾采访过很多名人、大家,他们的学识、学养,令人敬佩。我还有一个感觉,那就是:许多如雷贯耳的名流大家,他们的照片与他们的成就落差太大,往往是图片上的“贫下中农”。看着刘心武先生这幅传神的照片,我总想起北京那家宾馆简陋的会议室,想起那十八分钟似无米之炊般的拍摄。■

# 数码摄影,就这么任性

文/周伟

一不留神,人人都成了摄影师了。

这种感受在旅游景点最强烈。去年秋天我去西藏,蓝天白云、湖水雪山自不待言,所到之处无不充斥着快门的咔嚓声。印象最深的是布达拉宫晚8点的亮灯,时间一到,广场成了快门声的海洋,淹没了一切。

西藏是观摩摄影器材的好去处,一人使用两种器材(相机+手机)是最常见的。一个女游客挎着3台相机——佳能的大炮、标准焦距的尼康、索尼的微单,每到一个景点,她必须把三台相机都使用一遍。起初我以为她是专业的,后来才知道她也只是个摄影爱好者。跟我同车的还有一个中年男子,只用iPad,一到景点他就抢先下车拍照,快门很响,他“咣当、咣当”好一阵,随即发到朋友圈,然后开始拍视频,嘴里还大声说着解说词:“这里是雅鲁藏布大峡谷,画面中就是著名的大拐弯……”其他游客赶紧躲得远远的——他一般原地转三圈,谁愿意在他的视频里出现三次?可他全然不顾别人的感受,整个制作专题片的架势,就那么任性。

胶片时代的摄影没那么任性,那时候一卷胶卷拍完了,你只知道拍了多少张,至于有多少张能令你满意,还得等整卷胶卷冲印出来再说。快门牵着真金白银,所以那时按快门比现在慎重得多。其实数码摄影也是有成本的,但主要是购置器材的费用,后面的花销可以忽略不计,

所以一旦买了数码相机,大家都玩命似的拍,又因为随时可删,拿出来的照片是经过筛选的,起码没有偏焦、没有闭眼、没有七倒八歪。照片没有大毛病,人们出于礼貌就得夸几句,拍摄者很容易由此产生成为名家的冲动,然后就更加任性了。

为这种任性推波助澜的还有手机,iPad以及社交网站。既然可以随便发,那就只要醒着就发。一杯咖啡、一盘瓜子也要拍下来发到朋友圈里,似乎唯有那样才能显示活得多么充实。还有成天玩自拍的女孩,抬眼、撇嘴,用不变的姿势证明自己仍然娇滴滴,我还见过中年妇女也这样自拍的,是否娇滴滴自有公论,但任性是不争的事实。

数码相机的普及降低了摄影的门槛,如同微博微信降低了写作的门槛、卡拉OK降低了唱歌的门槛一样,不过好像摄影的降幅更大。一位著名作家对我说:“我和一位摄影家一起,拽着拉杆箱在西部农村走了一趟,他拍照我也拍,结果照片是一样的。摄影家真好当!”

这话对不对我不敢说,但它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拿着数码相机时都那么任性。

再说一下在西藏用iPad的中年男子吧。他拍完视频,大家上车前往下一个景点,他会拍拍我的肩,让我看他刚发到微信里的照片。那些照片下已有十来个赞了,这多少也解释了他为何那么任性。■